

理论视点

2016 年第 8 期 总第 24 期

西安石油大学党委宣传（统战）部 编印

2016 年 10 月



西安石油大学
新闻客户端



西安石油大学
官方微信

目 录

信仰、纪律、牺牲——长征精神的当代启示.....	1
廓清党性与人民性关系的认识误区.....	7
统战工作中的“分众统战”.....	11
能源变革关键在于技术创新.....	14
完善现代大学治理体系.....	17
锐词(24).....	20
推荐书目(22).....	21

报送：省委高教工委宣传部、统战部，省委宣传部理论处、研究室，
省委统战部六处。

抄送：校领导。

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

主送：各学院党委，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各院（部、系），
机关、教辅、后勤各单位，各民主党派。

党委宣传（统战）部

2016年10月9日 印发90份

信仰、纪律、牺牲

——长征精神的当代启示

王传利

习近平总书记参观“英雄史诗不朽丰碑——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主题展览”时指出：“8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胜利完成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个伟大壮举将永远铭刻在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的史册上。红军长征的胜利，充分展现了革命理想的伟大精神力量。”

红军长征展现的伟大精神力量的核心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坚守、钢铁般的纪律和义无反顾的牺牲精神。今天，回望长征，再一次重温 and 感受长征精神，对做好新形势下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反腐倡廉和制度等各项建设具有极大的激励和启发意义。

一曲壮丽的理想信仰史诗

80年前的长征，以人类罕见的英雄壮举，感动了几代中国人乃至世界人民，已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红色教育典范。毫不夸张地说，伟大的长征就是人类历史上一曲壮丽的理想信仰史诗。

人们常说，共产党是靠贫苦百姓打的天下。其实，在由劳苦大众为主体的队伍中，还有一个出身未必穷困的群体。共产党的高层人士，有的出身钟鸣鼎食之家，出过国留过洋，见过大世面。这些出身豪门的共产党高级干部，按照其才华或身世，本来可以享受一种有别于艰苦长征的富贵生活，但他们超越了普通人追求富贵享乐的低级趣味，舍弃豪宅华屋，在雪山草地间天当铺盖地当床，草毯泥毡扎营盘；抛却山珍海味，甘愿在高原寒炊断粮之际，皮带野菜充饥，忍受饥寒交迫。这就是理想信仰的力量，这就是理想信仰的崇高境界。剥削阶级的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哲学，无法解释红军将士的行为逻辑；资产阶级学者关于人性自私的经济学假设，在这些胸怀崇高理想信念的伟大人物做出的伟大举动面前，变得苍白无力。

精神的力量能够战胜任何艰难困苦。正是信奉革命理想高于天，红军将士才表现出了对革命理想和事业无比的忠诚、坚定的信念。正是革命理想高于天，无数红军将士在长征途中能够不怕牺牲、前赴后继，勇往直前、坚韧不拔，众志成城、百折不挠，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这种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改造思想、提高政治觉悟的硕果，是中华民族持久蕴积的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

长征精神是当下党的理想信念教育的活教材。95年来，无论是处于顺境还是逆境，我们党从未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不可否认，当前我们党员干部队伍的主流是好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能够做到克己奉公，勤勤恳恳地为党和人民工作，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有相当数量的共产党员对于名誉地位和形形色色的特权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渴望。有的热衷于拜佛求仙，不问民生问鬼神；有的信奉金钱主义，追求个人名利和享乐至上。一位曾荣获“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的某国企领导，竟然怨责自己被共产主义“这个口号骗了十几年”。这种惊人的言论，已离共产党员应该具备的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十万八千里了，严重损害了95年来共产党员在百姓心中树立的“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光辉形象。导致这些现象的原因很多，但不容忽视的关键问题就是理想迷茫、信仰动摇，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立场不牢固。针对此，全党有必要时时重温伟大的长征精神，再次思考我们当初为什么出发，从中汲取继续前行的信心和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理想信念教育，他指出，理想信念坚定是好干部第一位的标准，“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一个政党的衰落，往往从理想信念的丧失或缺失开始。”在纪念建党95周年讲话中，他再次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就是因为从成立之日起我们党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经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奋起，归根到

底是因为我们党有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8800多万党员只有牢记我们党的理想信念，不断传承和发扬红军长征精神，虔诚而执着，至信而深厚，才能够有力地应对时代风云变幻，成为坚不可摧的政党组织。

钢铁铸就的纪律

即便是曾经与中国共产党为敌的西方人也不得不钦佩当年毛泽东率领工农红军走过的万里长征，认为其堪称人间奇迹。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时代周刊》评论说：红军长征的胜利，“与哥伦布对美洲大陆的发现一样，是震撼世界的成就”。这个胜利来自于绝大多数红军将士坚强有力的团结一致，是钢铁般的纪律锻造了钢铁般的队伍。陈云曾化名“施平”在《共产国际》上介绍长征的红军将士们：“他们无时不顾及到革命的利益。党给他们什么命令，他们都能独立执行。他们自己想出主意来运用机动战术，但是上级的命令则绝对执行。正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领导干部，所以这次伟大的西征才得到这样巨大的胜利。”“每个红军兵士都晓得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都是一些很好的传统，我们要求每个兵士都要遵守。”（董必武等：《红军长征记》第472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然而，在长征路途中，党内军内并不是风平浪静的，而是发生了多次激烈斗争。且不说遵义会议上发生的激烈的思想交锋，就是在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后，在军事行动失利之后，依然有一部分红军将领认为，是毛泽东将红军带入绝境，多次提出撤换毛泽东。特别是土城战役失利，引发一些官兵对毛泽东的议论和不满，怀疑“红旗究竟能打多久”。而张国焘的分裂阴谋则让中央红军一度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1960年10月22日，斯诺问毛泽东：“哪个时期使你感到是最黑暗的时期？”毛泽东回答，“张国焘闹分裂，那是最大的困难”。（《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13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毛泽东把一四方面军分裂和被迫北上称为比1927年大革命失败还要黑暗的时刻。当时党内面临着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

在长征路途中发生的这些论争，都涉及如何提高党员组织纪律性的问题。长征路途上发生的这些斗争表明，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奠定了合格的共产党员的思想基础，坚定的理想信念有助于遵守党的组织纪律，但一个共产党员不会因为确立了政治信仰而不犯组织纪律性的错误。也就是说，解决了政治信仰方面的问题后，共产党员还要进行党性锻炼，增强组织纪律性，团结一致，方能成为优秀的共产党员。张国焘分裂党中央，就是与他长期恃才傲物，目空一切，大搞宗派主义分不开。他无视党的组织纪律，犯下了极其严重的分裂党中央的政治性错误，给红军尤其是他领导的第四方面军的长征增加了困难。所以，在坚定革命信仰的同时，必须不断增强有助于实现理想信念的组织纪律性。

长征昭示我们，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是党的事业胜利的坚强保证。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富有战斗力，是因为它是由严格的组织纪律巩固下来的政治组织。党组织是由具体的个体组成的，由于每个人的阅历、经验、出身、教育背景等方面存在差异，对同一个问题的看法难免不同。问题的关键是，在党员个人认为是正确的意见与党组织的决议不一致时，依然能够遵守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党的纪律，这是最为可贵的。当一个党员个人正确的意见没有马上为党组织所接受，没有上升为党组织的决议时，他可以坚持向组织陈述自己的意见，也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以待未来实践作出检验。但党具有严明的纪律，绝对不允许任何党员为一己之见、一己之私而背叛组织、分裂组织，绝对不可以不执行党的决议，绝对不允许公开发表违背组织决定的言论，绝对不可以参与各种非法组织和非法活动。

毛泽东比一般的党员更早认识到教条主义的错误，但他遵守党的组织纪律，一直在党内进行艰苦的说服教育工作，一直在党内启发教条主义者的觉悟，努力维护着党的团结。而张国焘则狂妄自大，固执己见，拒绝执行党中央北上的决议，命令全军按照他的个人意志南下。对比两人的纪律观念和党性修养，高下立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当前主要的挑战还是党的领导弱化和组织涣散、纪律松弛。”不扭转这种局面，就会影响党的战斗力，动摇党的执政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严明党的纪律做出一系列新的规定。新修订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并制订了《中国共产党党内问责条例》。党中央强调规矩意识，第一位的是组织纪律和政治规矩。党要管党，首先要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从严治党，首先要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即将召开的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党中央将对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严肃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做出全面部署，必将开辟党的建设工作的新局面。

为有牺牲多壮志

世界上不曾有过像中国工农红军这样的军队，无论是政治领导、军事精英，还是不识字的红军小战士，他们都坚信自己是一个伟大事业的奋斗者，都坚信中国革命的队伍“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他们激情万丈、前赴后继、视死如归，决心为救国救民牺牲一切。

红军长征不是简单地转战、打仗，而是面临严峻的三大考验，即革命与反革命的生死较量，党内团结与分裂的尖锐斗争，官兵与极端恶劣自然环境的激烈对抗。踏上长征路，就意味着死亡时时相伴。无论是粤军、湘军、黔军、川军、滇军、马家军，还是中央军，都不容红军在他们的地盘上逗留，都追着赶着杀红军。

10922人的红八军团，因在战斗中损失严重，在红军编制序列仅存60多天。在二万五千里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1名红军将士永远地倒下去了。红2军团4师1500多人，从草地走出来时剩下不到700人。长征路上，牺牲营以上干部432名，包括军以上干部8名，师以上干部80多名。单是湘江一役，就有13位团以上干部战死，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为3万多人。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这种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是长征精神价值宝库中最闪亮的部分。

长征先烈用生命告诉人们，没有勇担历史重任、敢于作出巨大牺牲的气概，红军就难以走出绝境。今天，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中，同样需要红军长征那种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当然，这里的牺牲不一定是抛头颅、洒热血。改革开放时代，共产党人面临的是“先富”与“后富”、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吃苦与享乐孰先孰后的选择问题。没有奉献精神，为一点蜗角虚名、蝇头小利而投机钻营，就是背离长征的牺牲精神。能够做到让群众先富自己后富，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就是传承和发扬长征的牺牲精神。

长征将士们是在新时代的曙光升起前而牺牲的。长征是中国革命低潮的开始，又是中国革命高潮的序幕。长征先烈们牺牲了有限的生命完成了无限的事业，是人世间真善美的体现，是历史必然性与合目的性的彰显，恰到好处地注解了短暂中的永恒，有限中的无限。历史将证明，长征先烈英魂永恒；历史还将证明，长征精神必将日益成为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动力。

（摘自2016年第19期《红旗文稿》）

廓清党性与人民性关系的认识误区

龚少情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意识形态领域关乎舆论导向的重大问题。但在这个原则性问题上仍存在一些认识误区，特别是那种把党性和人民性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错误认识，不仅曲解了党性与人民性的相互关系，而且还对党的性质和使命造成了混淆甚至迷失了正确的方向。当前廓清这些认识误区，对于我们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地，站稳人民立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认识误区的主要表现。一是误认为既然党性源于人民性，那么为了人民性就可以放弃党性，甚至有人提出党性要为人民性让路。在这种观点看来，人民性是党性的来源和根基，那么人民性对于党性来说，就具有优先性，为了人民性，可以不讲党性，甚至可以放弃党性。所谓“什么时候人民政府变成了党的政府”就属于此类。这种观点割裂了党性与人民性的有机统一关系，甚至将两者放在对立的位置，形成所谓非此即彼的关系，其错误的严重是不言而喻的。

二是误认为既然党性是人民性的集中体现，那么两者讲一个就够了，主张讲党性就不需要讲人民性了。这种观点肯定中国共产党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党性是人民性的集中体现，但却强调没有必要再讲人民性，这又进入了另一个误区。所谓“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人民说话”，“我们只讲党性，不讲人民性”就是这种认识在作怪。这种观点并没有完整准确地把握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内涵，要害在于貌似很讲政治，实质上动摇党的群众基础，是对党与群众关系的破坏。须知脱离了人民性的党性是不存在的，不讲人民性，党性最终也会受到伤害。

三是误认为既然西方发达国家都是讲“公意”“公共意志”和“人民主权”，那么我们也应该突出“公意”，只讲人民性，不要讲党性了。这

种观点深受西方所谓的“契约论”和天赋人权思想的影响，又被西方议会民主制和普选制的表面现象所蒙蔽，认为在这些国家当中未经人民同意的政府不是合法的政府，国家的政策如果侵害了人民的利益，人民可以表示抗议和不服从，而各个政党的党性只是代表自己政党的党派性，不能与人民性并列。诸如此类的观点因为有所谓西方的民主理论作为掩护，具有很大的蛊惑力，其危害性是显而易见的。

四是误认为既然党在历史上犯过错误，现实中又有很多党员干部贪污腐败，那么党性就会背离人民性。这种观点以我们党历史上曾经经历的一些挫折以及现实生活中一些党员领导干部腐化堕落的案例作为依据，得出党性可能会背离人民性、党性不一定始终与人民性保持一致的结论。这种观点乍一听似乎很有道理，但却是以个人这个局部代替了党这个整体，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这一原则上的反映。

认识误区的思想成因。一是脱离了一定的社会关系就不可能正确认识党性与人民性的关系。政党总是一定社会阶级斗争的工具，人民是一定社会的主体，党性与人民性的关系反映了政党与社会的关系，归根结底应当放在具体的社会条件中去考察。马克思曾指出，不存在一个独立于世界之外的抽象的、普遍的人性。同样，也不存在独立于世界之外的抽象的、普遍的党性与人民性，必须联系政党与人民所处的具体的社会经济关系，才能够准确把握党性与人民性的本质内涵，也才能够深刻认识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关系。而上述认识误区的一个共同点便是脱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党性与人民性的具体关系，或者将西方发达国家中的党性与人民性的关系简单地移植到中国，泛泛而谈所谓的党性与人民性的关系，得出的结论肯定是似是而非的不切合中国实际、甚至是荒谬的结论。

二是缺少历史的科学分析，对党性与人民性关系的认识就容易陷入各种各样的误区。列宁曾指出，对于任何问题的认识，都必须提高到一定的历史高度，看看它发生的具体历史条件和历史作用。把政党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起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原因。在

95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跨过一道又一道沟坎，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为中华民族作出了伟大历史贡献，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这些都是不争的历史事实。考察党性与人民性的关系，就必须考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人民群众生活的历史变迁、党带领人民取得的辉煌成绩，等等。如果撇开这些去谈党性与人民性的关系，就是罔顾历史事实。

三是离开了联系、发展、全面的观点，就容易在党性与人民性关系问题上产生片面性。联系、发展、全面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也是我们分析党性与人民性关系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如果只看到党曾经犯过的错误，看不见党是怎么改正错误的；党又如何从改正错误走向成功的，那么就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片黑暗的感觉，对党性与人民性的关系就会得出带有片面性的判断。如果只看到人民性是党性的来源，却看不到党性对人民性的引领和提升，只看到一些党员干部背离人民性的现象，却看不到党从整体上在维护、实现人民利益上所做出的巨大努力，当然也就会得出为了人民性可以不要党性这样偏激的结论了。

需要正确把握的几个理论问题。一是党性与人民性关系反映了政党与人民的关系，反映了政党获得人民支持的程度，是一个表征政党社会基础的重大问题。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来看，苏共党内存在的严重腐败现象、党员干部理想信念的动摇和宗旨意识的缺失等，最后导致了党性的淡化，扭曲了党性与人民性的关系，直接动摇了苏共的社会基础，最终被人民所抛弃，也就不足为怪了。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立场，始终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为根本追求，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我们党始终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是我们党所以获得广大人民的衷心支持，拥有最为广泛的社会基础的原因所在。

二是应当从党性的深刻内涵来全面理解党性与人民性的关系。刘少奇同志认为，党性是阶级性的最高而又集中的表现，是无产阶级利益最高而又集中的表现。这是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对党性的本质内涵所作的抽象概括。按照这一概括，中国共产党的党性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方面，党性是所属阶级意志的体现，也是广大人民群众意志的体现；另一方面，党性是从全局和长远的高度对人民群众意志和利益进行升华和引领。由此可知，党性与人民性是完全一致的。同时，党是由一个个的党员所组成，要通过一个个的具体政策来实现执政理念和目标。因此，党性还必须落实到具体行动上，在党的路线政策之中体现出来，在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执政为民的行动中体现出来。我们常说的一个党员党性强不强，就是指的这个意义上的党性。

三是在全面从严治党中始终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党的先进性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苏联解体，归根结底在于苏共背离了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原则。而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始终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这与我们党95年来始终高度注重自身建设是分不开的。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出发，作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我们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加强党性教育和党性锻炼，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始终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的高度统一。

（摘自求是网）

统战工作中的“分众统战”

杨卫敏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我国党外知识分子已经达到8900万，占知识分子总数的75%。现在，党外知识分子队伍构成更加多样，需要针对不同特点分类施策。”党外知识分子中的很大一部分人是体制外知识分子，也就是自由择业知识分子，其类型很多。《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将其归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并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分析出来，这样“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实际上就专指自由择业知识分子。由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各群体之间存在的社会层次、社会角色与自我定位、政治思想倾向、政治追求与参政议政意向、政治参与渠道和难度等差异，分众统战势在必行。分众统战有利于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有利于做好代表人士的培养选拔工作、有利于更好发挥各个群体代表人士的作用、有利于更好地实现大团结、大联合。

“分众”与“大众”相对，最早是营销术语，后在传播学中广为应用，意指针对差异较大的不同受众群体而量体裁定做差别化的传播内容和方式，以提高传播实效，降低传播成本。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中引进这一概念，指的是关注新的社会阶层不同群体的多样性、层次性和差异性，对差异较大的不同群体采取不同的统战原则、内容、方法和载体，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提高工作实效，达到统一战线的共同目标。尽管“分众统战”势在必行且在实践中已经存在，但毋庸置疑，这项工作处于自发、被动的初始阶段，分众统战的理论、平台、载体、机制都未形成，对新的社会阶层的分类仍然粗略，对部分群体的工作仍然比较单薄，对部分新的群体仍然关注不够，对部分群体的工作仍然未形成合力。为此，必须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设。

厘清概念，树立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分众统战”的意识。体制外的自由择业知识分子范围最广、种类最多，目前主要包括：新经济组织创业和

从业人员，新社会组织创业和从业人员，外资企业中的管理技术人员，新居民、农村社会组织中的领军人物，新媒体从业人员，网络意见人士，等等。但这是一个动态发展、不断扩展的范畴，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会不断冒出新的职业、新的群体来。《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不再一一列举，而是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这个概念一言以蔽之。但是，概念上的概括，并不意味着抹煞了各个群体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我们在开展工作时必须做到心中有人、有的放矢、分类施策。

分门别类，构建有针对性的工作平台。一方面是加强建设已有的各种统战组织。另一方面是有选择地强化各种社会组织的统战功能。如前所述，当前社会组织数量庞大，但很多组织的统战功能不明显，尚待开发。从实际情况看，这些枢纽型社会组织都是有主管部门和党建工作平台的。统战部门要充分利用这些枢纽型组织体系的有利条件，与民政部门、组织部门及有关部门党组织建立协同机制，采取建立统战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建立统战工作联系点等多种形式，把党的统战工作主动“嫁接”“粘连”上去。

掌握特点，探索有针对性的工作方法。新的社会阶层千差万别，工作方法必须抓住群体特点，提高活动的针对性。

开阔视野，建设各具特色的代表人士队伍。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是新的社会阶层统战分众统战工作的基础工程。要针对不同群体的职业特长和知识结构方面的特长培养选拔代表人士队伍。

着眼长远，形成有效的分众统战机制。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实践中，面对不断分化的新的社会阶层，原来的一些统战工作机制与方法，既有需要坚持的优良传统，也有一些需要与时俱进进行完善、创新的机制。从新的社会阶层的构成、现状、特点、需求、心理素质、成长轨迹和发展趋势着眼，围绕统战工作的基本职能和各项社会功能，以与时俱进和求真务实的精神，在继承和运用好统一战线已有的机制、载体和工作渠道的同时，充分尊重和适应新的社会阶层广大成员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

性、多变性和差异性 etc 特性，敢于突破一些不适宜的陈规旧制，以创新的理念、创新的态度和作风去积极探索新的机制和载体，从中拓展工作思路，创新工作制度，规范运行程序，不断增强党的统战工作的创造力、说服力、感召力，增强统一战线对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的吸引力、凝聚力和向心力。概括而言，要建立大统战与分工协作的工作机制、分类联系和发现报告机制、分众评价机制、分类培养机制等。

把握“分”与“合”的关系。“分”是为更好地“合”，“分”是“合”的手段，“合”是“分”的目的。社会群体越分化，越要学会建立“统一战线”，在求同存异中最大限度地把他们团结凝聚起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凝聚共识很重要，思想认识不统一时要找最大公约数。”因此，对新的社会阶层群体的思想引领工作必须寻找最大公约数。要通过小众化，达到大众化。同时，要把握好“分”与“合”的“度”，既要细分，又要注意某些交叉、相似群体的“联合”，如当前新居民、“蚁族”和维权律师等群体，他们思想活跃，数量惊人，充满活力，诉求越来越多，影响力越来越大，特别是律师，是规则的制定者和规则执行过程的评判者，经常会在重大事件的风口浪尖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些群体一旦在某个节点“统一”起来，作用是惊人的，必须将其视为一个集合群体并对其交流、交融开展研究。

(摘自光明网)

能源变革关键在于技术创新

陈庆修

能源技术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突破口。随着人们环保意识增强和世界范围内能源消耗加速，新一轮能源革命将从工业文明的规模效益转向信息时代以效益定规模的绿色低碳能源时代。技术创新在能源革命中起决定性作用，它是能源结构优化及转型升级的不竭动力。只有通过创新掌握核心技术，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才能抓住能源变革的关键、把握能源持续健康发展的主动权。

能源的分类方法很多，通常可将一次能源分为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和核能等。化石能源包含煤炭、石油、天然气、页岩气和天然气水合物等；可再生能源包含太阳能、风能、水力能、生物质能、地热能和海洋能等；核能可分为裂变能和聚变能等。煤炭、石油等传统化石能源具有价格相对便宜、使用方便的优点，其不足之处是污染严重；可再生能源解决了污染问题，但价格相对偏高以及存在受使用条件限制等不利因素。无论是实现传统化石能源的清洁化、低碳化、高效化利用，还是实现绿色能源的规模化以降低成本和便于使用，都要依靠技术创新与进步。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科技决定能源的未来，科技创造未来的能源。

当前生态环境的约束，已成为能源发展的最突出制约因素。能源革命基本发展趋势是供给消费清洁、绿色、低碳化，在大力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同时，着力发展非煤能源，形成煤、油、气、核、可再生能源多轮驱动的多元能源供应体系。从结构上看煤炭、石油等高碳化石能源将逐渐被天然气和页岩气等低碳能源取代，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开发使用、核能安全利用。同时，能源互联网和大规模储能以及先进能源装备及关键材料等重点领域有新的突破。绿色可再生能源技术、能源高效利用技术、节约能源技术和温室气体减排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是推动能源革命的主要动力，将极大地优化能源结构和时空布局。

因而，能源变革的关键在于科技进步，技术创新对推动能源革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推进技术创新，可以降低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的成本，提供更清洁、更价廉的能源产品；通过加强储能和智能电网建设，发展分布式能源，推行节能低碳电力调度，有利于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绿色智能的现代能源体系。

传统能源领域，集中在传统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大幅减少能源生产和使用过程中污染排放，对二氧化碳封存利用，加强能源伴生资源综合利用，构建清洁、循环的能源技术体系。

可再生领域，重点发展更高效率、更低成本、更灵活的风能、太阳能利用技术，因地制宜发展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利用技术；发展以可再生能源及先进核能制氢技术、氢气纯化技术，开发氢气储运的关键材料及技术设备，实现大规模、低成本氢气的制取、存储、运输、应用一体化。

核能领域，积极推动先进核能技术发展，重点发展第三代和第四代核电、先进核燃料及循环利用、小型堆等技术，探索研发可控核聚变技术，研究钍元素发电、月球氦三的开发与应用技术。

能源输送与储备领域，创新面向电网调峰提效、区域供能应用的储能技术，增强储能调峰的灵活性和经济性，掌握储能技术各环节的关键核心技术，推进能源技术与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加强整个能源系统的优化集成，构建一体化、智能化的能源技术体系，实现各种能源资源的优化配置。

装备领域，根据重点能源技术需要，重点研发特种金属材料、先进复合材料、高性能结构材料、特种无机非金属材料、高温超导材料、石墨烯等关键材料；围绕能源技术发展目标提供关键材料装备支撑，重点发展非常规油气开采装备、海上能源开发利用平台、大型原油和液化天然气船舶、核岛关键设备、燃气轮机、智能电网用输变电及用户端设备、大功率电力电子器件、大型压缩机、特种用途的泵、阀等关键装备，全面加强

能源供给基础设施建设的技术支持。

节能领域，大力发展提高能效与节能减排技术，创新清洁技术、绿色技术，在现代化工业节能技术、新型建筑节能技术、先进交通节能技术以及能源系统全局优化技术等方面有新的突破，以技术创新提高能效、推动节能降耗减排，催生新产品和新模式，提高用能设备设施的效率，形成节能低碳的产业体系。

从能源发展的历程来看，通过技术创新降低可再生能源和其他新能源的成本，可以为市场化价格机制的形成、进而为构建有效竞争的市场机制和市场体系创造有利环境。同时，充分发挥技术创新的动力源泉作用需要制度、政策、市场相互作用、协同演进。要把握好能源技术创新绿色低碳化方向，加快推进以价格市场化为核心的能源体制改革，分类推动产业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和制度创新，建立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供需形成价格的现代能源市场体系，形成有效竞争的市场机制，建立气候与环境友好型的能源体制，为推动能源技术创新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必要条件。

总之，技术创新是能源发展全局的核心，在能源革命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它是引领能源发展的第一动力。我们必须要把把握好能源变革绿色低碳化方向，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为建设现代能源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摘自2016年10月03日 《学习时报》）

完善现代大学治理体系

陈克恭

遵循规律 回归本位

为了建设“两个一流”大学，全国高校都在围绕完善现代大学治理体系的目标，创新探索着符合各自实际的实现形式，可谓空前活跃，形式多样。然而，对现代大学治理体系中“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这四句话的贯彻落实，认识上仍有概念混淆、边界不清的问题，在实践中存有体制机制与系统功能不协调，导致政策要求操作性不强的问题。更有甚者，把大学治理的主要矛盾简单地看作是处理好书记与校长的关系。这些问题直接影响着现代大学治理体系建设的实效性。

可以说，高等教育改革正处于一个步入新周期的历史拐点。在历史拐点处，往往也是思潮迭起的时期，而这个时候的选择尤为关键，越是关键的时刻，越应该去繁就简、遵循规律、回归本位。确切地讲，就是要以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学哲学用哲学”，把握对立统一规律，讲清楚一些基本道理，坚守住基本底线。实践证明，只要正确运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这个思想武器，自信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思想家园，就一定能够解决问题。

“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正确认识“矛盾”二字，把握住好两个方面，既是我们的世界观，也是我们的方法论。既然矛盾是事物存在的普遍法则，我们就一定要有勇气面对矛盾，提高把握矛盾的能力，保证事物健康可持续发展。建设现代大学治理体系也要遵循这个法则，首先要找到“对立统一”体，其次要建立起促使矛盾双方平衡的体制机制。

把握住大学行政管理的特殊性

“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是具有中国特色现代大学治理体系的基本架构。那么，在这个架构中它们的关系是怎样？我认

为，“党委领导（党的领导）、民主管理（群众路线）”位于外层系统，“校长负责（行政管理系统）、教授治学（学术活动系统）”处于内层系统。“党委领导、民主管理”是现代大学治理体系的根本保障，“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是现代大学治理体系的基本主体，两者关系协调统一。

在“党委领导、民主管理”这对关系中，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党委领导，而促使事物发展的动力则在群众路线。正如根有多深、树就有多高一样，植根于人民群众的深度决定着领导水平的高度。党的历史实践多次证明，党的领导正确与否取决于是否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什么时候坚持了群众路线，事业就会从胜利走向胜利，什么时候偏离了群众路线，事业都会一挫再挫。这也正是为什么党的十八大之后，在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千头万绪、异常繁重，国内外挑战重重叠加、错综复杂的时候，党中央却作出在全党范围内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重大战略决策的根本原因。

在“校长负责、教授治学”这对关系中，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校长担负的责任，而促使事物发展的动力则在教授治学的动力。处理好这对关系，必须把握住大学行政管理的特殊性。在大学，营造一个学术自由的氛围，如空气之于生命一样重要。然而，有人群就必须有秩序，有师生群体也必然少不了管理。所不同的是，这里的管理是为保障学术自由而有的管理；这里的管理重在“理”，而不在“管”；这里的管理是顺应教育规律的“理”，而不是主观意识上的“管”。去“行政化”是去过多过滥的、凌驾于客观规律之上的“管”，而不是去客观需要的“理”。主观必须符合客观这个道理，决定了大学行政管理系统的服务职能和服务角色，也决定了大学治理体系中行政管理的价值取向。

在“党委领导”下一旦构建起“校长负责（行政管理系统）”与“教授治学（学术活动系统）”的关系，“民主管理”就会是一种必然结果。

增强实践性和针对性

结果是过程之结果。为了增强“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

主管理”的实践性和针对性，西北师范大学探索实行以“党政领导班子议事协调会议”形式统筹日常工作的运行机制，形成党政合力推进学校科学有序运转的工作格局。党政领导班子议事协调会议本着“议事不定事、务虚求共识”的原则，就学校相关事务讨论交流意见。大家达成基本共识后，将相关事务简单分为“关乎根本、长远和三重一大”和“日常行政工作”两大类，分别提请党委常委会或转交校长办公会研究，形成党委决策或行政决定。提请和转交的过程是三思而行的过程，更是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过程。凡涉及学术和教师发展的专业问题时，原则上必须先转交相关专门委员会，由专门委员会组织在“教师发展中心”这个平台上“开放配置资源、开放评审成果、开放评定优劣”，形成专业意见后，再行党委决策和行政决定程序。“三开”的过程，既是“教授治学”的过程，也是倒逼“校长负责”行政管理系统科学化的过程，更是促进教师发展的过程。分、合，再分、再合，大小事宜统分结合、班子成员分工负责，形成统分结合体，这就是党政分工不分家。如此，就逐渐形成了一个与学术生态环境相适应的政治生态环境。

同时，学校尝试制作“学术年历”，把全年的工作统筹起来。学科建设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和一些专门委员会把每年要做的常规工作提前规划好，形成一张年度计划表，将其镶嵌在年历中，就有了学校的学术年历，师生按这个年历安排全年工作，就会井然有序。

“两个一流”大学的建设目标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治理体系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制度保障。对这一命题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既具有现实意义，也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摘自2016年10月05日《光明日报》）

锐词 (24)

逆全球化

在全球化趋势下，世界各地联系不断增强，国与国之间在政治、经济贸易上互相依存。但近些年，特别是美国发生经济危机之后，以孤立主义、保护主义为代表的“逆全球化”思潮抬头。有些国家倾向于对世界经济、国际贸易设置种种新的限制和关卡，以优先维护自己的私利，从而做出与全球化相反的选择和动作。

隐形冠军

指一些企业虽然社会知名度不高，但有着独特的竞争策略，往往专注于某个细分领域，牢牢控制着本地、地区甚至全球市场，占有率往往大幅领先第二名及以后的追随者。在我国，隐形冠军主要集中在机械设备、电子、纺织服装等行业。专家指出，隐形冠军在未来十年能否大量出现并且发展壮大，将是中国是否能完成产业升级的核心因素。

布里丹毛驴效应

指决策过程中犹豫不定、迟疑不决的现象。法国哲学家布里丹养了一头小毛驴，毛驴站在两堆干草之间，一会儿考虑数量，一会儿考虑质量，一会儿分析新鲜度，始终无法决定究竟选择哪一堆好。于是，这头可怜的毛驴在无所适从中活活地饿死了。导致悲剧的原因就在于毛驴左右都不想放弃，不懂得如何决策。

巨婴

即“巨大的婴儿”，指生理上已经成年，但心理上的成长相对落后的成年人。他们依旧像婴儿一样，从本我出发，喜欢满足自己的欲望，不顾及他人感受，做事幼稚，分不清自我与他人的界限。巨婴心理是一种心理病态，主要成因是在幼儿阶段由于缺乏正确照顾而导致的心理缺失。

高级黑

网络用语，意指那种委婉的讽刺或揶揄。简单地说，就是表面上夸奖，实际上讽刺，但是夸奖的东西和讽刺的对象并不是同一事物，而是借助被夸奖的东西来讽刺要批评的对象。比如，图片中一株草长在沥青路面上，明面意思是这株草生命力很顽强，但实际上是讽刺沥青路面偷工减料，质量不过关。

推荐书目 (22)

《胡锦涛文选》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

人民出版社出版

内容简介：

胡锦涛同志是党的十六届、十七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是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创立者。党的十八大强调，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新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指导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2013年7月，党中央作出编辑出版《胡锦涛文选》的重大决定。《胡锦涛文选》的出版发行，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胡锦涛文选》收入了胡锦涛同志在1988年6月至2012年11月这段时间内具有代表性、独创性的重要著作，共有报告、讲话、谈话、文章、信件、批示等242篇，很大一部分是第一次公开发表。《胡锦涛文选》生动记录了党的十六大后的10年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科学总结了我们党依靠人民战胜一系列重大挑战、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新的重大成就的宝贵经验，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创造性提出的重大理论成果，全面展示了科学发展观孕育、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是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最好教材。